





## 第一章

# 辛亥革命研究的整體性

桑兵

廣州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

### 一、引言

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較為成熟的領域之一，要想進一步深入擴展，不宜僅僅以革命為中心，或以革命的問題意識為取向，簡單地放大。應將辛亥革命聯繫到歷史與時空的脈絡之中，不是作為斷代史，而是將整個辛亥時期放進近代中國、東亞乃至世界歷史，以及3,000年中國歷史的長河及不作分門別類的狀態中去，進行貫通式考察，用整體的眼光探究革命乃至整個辛亥時期的歷史。辛亥時期革命當然處於重要位置，而清季十年（即辛亥革命前十年間）中國因為全面的變動，導致中國社會文化前後兩分，朝野上下各政派群體均形成錯綜複雜的作用。辛亥時期知識與制度的全面轉型，造成國人思維行為的根本變化，必須上起嘉道（嘉慶、道光時期），理解整個清代以及清代前後，才能有恰當的認識。同時內部應注意在文化集合體的全局之下研究的整體，避免區域分割；對外應防止在進入世界之際，仍保持中國與世界相對的觀念，在中學、西學與東學的架構下，探究知識與制度轉型的全過程和各方面。

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整個近代史研究領域乃較為成熟的範疇之一，因此，現代學人很少直接選取相關題目。即使逢紀念周期的應景之作，也被質疑雖然扣題，卻少新意。當然，並不是說辛亥革命的

研究已經完善，只是難度較高，一般不敢輕易下手。換一角度，也可以說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經過了多以新材料發現新問題的初級階段，正在走向摸高探深的成熟期，所面對前賢遺留的各種難題，往往需要學人有較好的訓練，超越已有的局限，才有可能別開生面，達致高明的境界。如果一味鑽空子找漏洞，而美其名曰填補空白；或是簡單拼湊，而自詡為綜合概括，或許能夠得逞於一時，終究不能將辛亥革命研究發揚光大。

對於這一些前人研究較為成熟的領域如何進一步深入擴展，上世紀以來不斷有學人貢獻真知灼見，只是宣導的結果，亦很難扭轉顯學退隱的趨勢。要想再創新高，似不宜奢望形式上重現昔日熱鬧的景象，而應該學習古史研究的精神——板凳甘坐十年冷。古今中外高度的學術發展，都不是人多勢眾所能體現。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影響都不在一時一世。時下的後進學人，更喜歡選擇由新材料或新觀念以發現新問題的捷徑，而不願嘗試承接前賢的未竟之業，紛紛將目光轉向其他方面。這樣的趨易避難，看似取巧，容易成名，卻很有可能聰明反被聰明誤，最後難以得道。其實，前人關注的往往是樞紐性的大問題，儘管近代學術史上不乏附庸蔚為大國的先例，時段與層面下移也是大勢所趨，畢竟接着做比反着講更接近大道正途，且更能體現學術研究的深度和高度。在能夠接下去的基礎上再尋求擴張，而不是因為接不住，才不得不用不破不立的方法打倒前人，又為了刻意超越前人而鑿空蹈隙；開新，實際上成為學樣能力不足又急於求成的遁詞，於是只好求諸域外，最終難免落得捨己從人的結局。哪怕能夠流行一時，學術價值也不高，在學術思想史上，不能居最高之地位，而且終將歸於歇絕。

中國近代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一大問題是，由於材料太多，不得不縮短戰線，於是專題研究取代了學術準備，導致分化過細，不能貫通。時間上分段，空間上分區，問題上分類，專題研究的深入異化成了學術視野的孔見，結果流於盲人摸象。歷史研究的貫通並非一般所謂擴展研究視野和領域，注重整體性，不是僅僅以辛亥革命為中心的延伸，或是作為一種斷代史的劃定，而是將辛亥革命放到歷史發展的時空整體及聯繫的脈絡之中，將辛亥革命視為整個歷史

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樣的取徑並非只是以辛亥革命問題的意識作範圍的擴展，那樣做很可能只是把辛亥革命的問題放大，而是將辛亥這一時期的全部歷史放進近代中國、東亞乃至世界歷史的整體、3000年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以及不作任何分門別類的細分化的歷史狀態中，進行貫通式考察，用整體的歷史眼光探究辛亥革命乃至整個辛亥時期的歷史。類似辛亥這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且對歷史發展進程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時期，不僅整體意義必須古今中外地加以認識，就連具體問題要想認識得當，也需要貫通的眼光。這樣的取徑做法，其實不過是前賢治史的基本，因而卑之無甚高論。只不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現狀，與之距離甚大，而其趨勢，還可能漸行漸遠，所以值得特別強調，以免流弊滋生，以至於不可收拾。

限於篇幅，僅就若干方面，舉例說明，點到即止。

## 二、辛亥時期的整體性

辛亥革命研究有較長時間都只注重革命黨，而忽略其他方面，中外學人早已明確提出加強研究保皇黨、立憲派、乃至清政府，都可以視為補偏救弊之舉。單純從革命的角度立論，導致辛亥時期歷史整體性的失位，不僅全局觀念破綻百出，而且連具體論證也捉襟見肘。

辛亥時期革命當然處於無可爭議的重要位置，理應作為研究的重點，對此大概不會有太多的疑問。可是這一時期所發生的不僅是革命的歷史，即使以革命為中心，也還有許多看似與革命沒有直接關係，或是以往用革命的眼光觀察不到，但是對於歷史全局的發展和變化具有重要影響的活動；如果不能把握整體，對於革命的認識也難以適得其所。現行的歷史分期，不免以後來的目的論作取捨，多少忽略了歷史進程本來的意義。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相關研究積極評價辛亥革命的作用，也僅僅強調實現共和政體，至於消極的看法，則不過是換了一塊招牌。這樣的觀念，與辛亥時期中國歷史進

程發生整體根本性變動的實情差距甚遠。清季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間，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發生的全面變動，是因應千古未有之大變局的總結式變動，所造成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在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只有周秦、唐宋時期的變化可以與之相較，而且就變動的範圍和程度而言，辛亥時期甚至還在前兩期之上。以辛亥時期為界線，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發展承前啟後，形態及取向各異，截然兩分。正如美國學者任達 (Douglas R. Reynolds) 的《新政革命與日本》(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一書所說：

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의思想和體制都刻板地遵從了中國人特有的源於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後，到了1910年，中國人的思想和政府體制，由於外國的影響，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最根本含義來說，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國的新舊名流（從高官到舊紳士、新工商業者與學生界），改變了語言和思想內涵，一些機構以至主要傳媒也藉此表達思想。在體制方面，他們按照外國模式，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政府組織，改變了形成國家和社會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國의思想和體制與1925年的、以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現基本的連續性，它們同屬於相同的現實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現，在思想和體制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脫離，而且越離越遠。<sup>[1]</sup>

拋開其中以變化為進化，以現在為現代的觀念，以及論證方式較多檢討前人成果，較少直接研究材料和史事等諸多可議，作為現象與事實的描述判斷，大致可以成立。就此而論，辛亥時期的變動已經規定了歷史前進的基本方向，以後的國民革命等，則是在革命

---

1. 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15。關於對該書的較完整看法，參見桑兵：〈黃金十年與新政革命—評介《中國，1808–1912：新政革命與日本》〉，《燕京學報》新4期（1998），頁321–333。

的動力和領導者方面有所調整。如果用這樣的視野來檢討，無論革命派、保皇黨、立憲派、社會人士，甚至清政府和統治集團的各派系，除少數人外，都在因勢求變。只不過因為利害各異，變的取向和求的方式有所不同。各方面公開的爭與暗中的合，看似相反，實則相成。而不同的利益訴求和勢力爭奪，使當時各方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既相互利用，卻又相互纏鬥。在此觀照下，各種政派、社團、群體、階層以及人脈關係便能全面展現，更可前後左右貫通聯繫，避免以單一方面的取向為普遍準則，以就事論事為具體分析，以盲人摸象為管中窺豹。只有得其所哉地理解各方的所有言行，只要沒有牽強取捨、放大掩飾、以偏概全甚至故意曲解，革命以內的辛亥歷史的線索脈絡才有可能全面展現，而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才有可能充分顯示。

影響革命史的觀念很大程度源於後來國共兩黨各自主張自身的正當性及正統性。在這方面，雙方有一定的近似。今人追究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緣起，大都着重於羅家倫、蔣廷黻等人的努力，以及中共方面關於黨史敘述的初期建構，對於國民黨方面所謂三民主義教育（黨化教育）的作用有所忽略。國民革命時期發源於南方的黨化教育，包括革命史、軍訓、三民主義思想在內，隨着國民革命的發展而迅速推向全國。只是各地大專院校在接受方面各有取捨。就目前所見，態度較為積極的東南各校撰寫教授革命史的提綱，可見大體框架與今日海峽兩岸的中國近代史大同小異，包括近代史開端、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的作用、以至洋務自強運動的地位等。國共兩黨關於中國近代史認識的顯著差別，在於對義和團的看法。所以1949年中國新史學會成立伊始就着手編輯的《近代史資料叢刊》，以《義和團》發端，即旨在旗幟鮮明地標明分野。

取向相近，有時會強化歷史認識，並朝着一定的方向傾側。就辛亥革命的研究而言，較為典型的有兩例，一是突顯清季各種政治勢力的勢不兩立，二是強調清朝與民國的水火不容。前者包括清王朝與反清勢力的對抗，以及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分歧兩方面。革命時代的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政治衝突無疑是你死我活，不過革命不是目的，而是在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時，解決問題的一種形

式。任何政治活動的台前幕後都會有所分別，公開敵對的雙方，因為中間存在種種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以及政治圖謀的需求，而保持多種聯繫管道。尤其是中國為倫理社會，由血緣、姻緣、地緣、業緣等紐帶連結而成的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各式各樣的人情世故，化為習俗禮儀制度，對於人們的思維行為具有重要影響，包括從業、政爭、聯姻、諜戰在內的許多社會行為，無不受此制約。

辛亥時期，保皇會、立憲派和革命黨，均以各種方式與各地督撫乃至中樞親貴建立並保持一定的聯繫，以達致各種目的。參與改制謀劃或捲入派系紛爭，甚至共同舉辦各種趨新事業。這些幕後聯繫的分合親疏，不僅影響統治集團各派與在野政治力量的關係，左右各自的政策方略，有時還會在官員之間明爭暗鬥的格局中，引起微妙的變化。而這些至關重要的聯繫，除了個別論著有所涉及，一般較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和相關歷史的敘述架構。誠然，諸如此類的隱秘研究起來頗具難度，一般學人不易下手，不過更為重要的原因，當是很難將它們納入既有的研究框架，不知如何安置才能得其所哉。無處着落，無力駕馭，於是索性避而不談。這樣的略而不論，在時下的歷史研究中相當普遍，其實也是削足適履，是闡割歷史的一種變相。

辛亥時期革命黨在與保皇會、立憲派論戰時，不免言辭激越，形容雙方的關係如同冰炭水火，勢不兩立。此節視為論戰一方的態度，固然屬實，作為評論對方行事的準則，還需推敲。整體而言，當時雙方仍屬於趨新陣營的一部分。後來的研究者不約而同地確指不革命的一方為清廷的幫兇，背後顯然有國民黨黨同伐異和中共對內對外路線鬥爭論戰的影子。受此影響，學界及坊間往往不假思索地輕信一些傳聞。顯例之一，是所謂秋瑾案由胡道南告密引發。關於此事，民初蔡元培即撰文為亡友辯誣，申明冤屈，「秋君一案，釀成於紹興知府貴福之電請，而說者則謂其端實發起於紹興紳士之告密。當時被告密的嫌疑、而為人所指目者頗多，而君亦居其一。君之不為此，當時即有人證明之，至今日而尤大白。」其實胡道南「好讀書，為詩古文辭，雅馴而綿密，然亦不守舊。歲戊戌，與新昌童君學琦設《經世報》，延章君炳麟為撰述員。當秋君瑾初回紹興，君於

中學堂外課，以《讀秋女士詩書後》命題，有欲以是陷君者，君不之懼。余與徐君錫麟，皆君故交，而昌言革命，君亦不以為忤。」而且蔡元培還現身說法，「予之急進主義，雖不為君所贊同，而吾兩人相信相愛，一如曩昔。」<sup>[2]</sup>後來者不察，仍然輕信胡為告密的元兇，要因之一，顯然是這樣處理比較符合今日中國近代史以及辛亥革命史的一般邏輯，所以容易被接受。

用革命的觀念考察清季民初的政權鼎革，其實是國民革命以後所認定的正確看法。在此之前，遜清皇室與民國政府之間存在形式上的禪讓和優待關係。因此，即便視為改朝換代，與明末清初的情形也有着很大分別。除了滿漢關係易位，對於多數的漢人而論，接受異族入主中原較難，棄之而去則相對較易。即使共和與帝制形式上並存共生，在朝野上下看來也並非絕無可能。據說南北議和曾打算改國號為中華聯邦共和國，大清皇帝改為中華聯邦共和國國王，屬憲法上特別地位，不得干預政事。同時設大總統，由議會公選，總攬行政權。國王與大總統待遇同等，前者世襲，後者任期四年。<sup>[3]</sup>這樣的一種君憲體制，在今人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而當時朝野各方並不認為是天方夜譚，如果不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堅決反對，作為鬧劇上演的可能性相當高。

北京政府時期，遜清皇室與民國政府保持一種微妙關係，不僅前朝臣子可以得其所哉，不少滿族親貴也自安其樂。如那桐等人對於民國政府就相當順從。有的滿族親貴甚至與小朝廷逐漸疏遠，拒絕參與復辟活動，反對滿洲國，抗戰期間也擁護國民政府，抵制日偽的勸誘，以至國民政府擬加以表彰，以正人心。而一些表示堅決與民國為敵或效忠清室者，如梁鼎芬、鄭孝胥、劉承幹等，原來與清室的關係相對疏離，有的甚至還一度萌生異心，因而在為數不多

2. 蔡元培：《亡友胡鐘生傳》，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卷2（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26-327。早年博士論文涉及此事，亦沿襲一般說法。當時擔任答辯委員的林增平先生曾不指名地提示應該注意不同記述。揣摩數年，才領悟其具體所指為何人何事。

3.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370-1372。

的真正遺老看來，不夠當遺老的資格，其態度行事不無矯情之嫌。這樣的情勢，一方面有減少社會犧牲衝突之效，另一方面則讓時人及後來者發出僅僅換了一塊招牌的批判之聲。將法國大革命奉為革命的典範，認為只有大規模流血犧牲才能徹底體現革命的真諦，相反，卻強化了辛亥革命過於妥協的印象。

遜清皇室與民國關係趨於緊張，其重要轉折是密謀復辟，繼而被驅逐出紫禁城。國民革命和北伐，繼承辛亥革命的方向，打倒從辛亥革命中漁翁得利的北洋集團，推翻北洋政府，令與北洋集團關係不錯的遜清皇室失去屏障。直接由反清革命黨演變而來的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清室與民國的關係全盤改寫，不再是禪讓，而是重新回到敵對狀態。而滿洲國的成立，清室徹底站在民國乃至全民族的對立面。後來國共兩黨各自主張自己的正當性，對於清季民初歷史的解讀不免受到影響，從不同的角度強化了對抗的一面。

### 三、古今的連貫性

今日の後學新進，常有一預設的誤會，以為古文和外文都不行，反而可以治中國近代史。這樣的退而求其次，便是將犯難誤認作趨易，立意一偏，必然淺嘗輒止，註定見識浮泛，學問難以達致高深程度。辛亥時期中國的知識與制度發生顛倒式的根本轉折，中國人的思維與行為隨之變化。而清代學問對歷代進行過系統的梳理總結，清代制度又是集歷代王朝體制之大成，要妥當理解辛亥時期的歷史，首先應該了解近代中國的整體，進而上出嘉道，把握整個清代，並且由清代以至歷代。所謂理解把握，不能簡單地依據現成的教科書或各種通史專史，因為這些晚清尤其是辛亥時期以來源自域外各種重新整理的系統，充其量只能說是後來的見識，而不能等同於所指稱的事實。二者之間存在許多的形似而實不相同。民國以後所講的「歷代」，許多意識其實出自清代，與歷代的本事本意既有聯繫又有分別。而清季改制，並非單純移植域外，也有不少自稱參照唐宋官制的成分。誠然，清季的知識與制度轉型，主要影響甚至藍本來自域外，可是承接知識與嫁接制度，所憑藉依託的還是中國固有的

學問和體制。不能貫通古今，解讀近人的言行，只好望文生義，格義附會，愈有條理系統，距離事實真相愈遠。凡事須知淵源流變的脈絡，研究近代尤其是辛亥時期的思想學術文化以及制度問題，必須縱貫古今，才能把握得當。否則，不僅門外文談，而且參野狐禪，而自以為見仁見智。以往的研究中，諸如此類的橫通之論不在少數。

思想學術與制度問題，固然要由古至今了解，才能把握從無到有發生演化的淵源流變，知人論事同樣不能於一時。例如，今日評價人物，多主張所謂階段論，以為是具體問題及具體分析的體現。此說作為整體之下把握具體的做法不無道理，可以起到防止人物研究，臉譜化及標籤化的作用，可是若不能善用，也會造成分裂的流弊，或是割斷同一人思維行為的前後聯繫性，或是片面解讀史事，不願產生複雜變數的各種相關事實，而引發的糾結影響。例如，肅親王善耆在清末的表現相當開明，其幕下聚集了各種趨新人士，以至保皇派和革命黨均與之暗中有所聯繫，而民初卻成為宗社黨的頭子，不惜與對華抱有野心的日本人勾結。站在維護清朝根本利益的立場，其所作所為不僅都是真心實意，而且一以貫之。早在1900年趨新人士為了救急應變於上海組織中國國會時，章炳麟具有先見之明地認為持論開通的滿洲改革者更加危險，公開提出不准滿蒙人入會。其《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稱：「或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雖在滿洲，豈無材智逾眾，如壽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愈材則忌漢之心愈深，愈智則制漢之術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陽稱平權而陰求專制，今所拒絕，正在此輩。」<sup>[4]</sup>此言後來果然應驗，所論較今人以辛亥為界，將善耆前後擷為兩節、分別評價的做法，更有助於理解善耆其人，而不只是議論其在各個時期所為之事。

即使專論革命，也不宜僅僅局限於辛亥一段。20世紀中國的關鍵字之一甚至首選，當屬「革命」。與中國歷史上主張革故鼎新之革命不同的現代革命，恰好在19世紀末從日本傳入中國，在辛亥時期蔚然成風，加劇或伴隨着中國的激烈動盪走過幾乎整個20世紀。百

4. 《中國旬報》19期，1900年8月9日。

年當中許多重要的歷史時期都冠以革命之名，如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民主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其內涵極為豐富。起初無論革命黨還是保皇派，都從積極的角度看待革命，並且聯繫古今中外，進行了大量論述。隨後在革命與否的方略取捨問題上，雙方出現激烈爭辯。儘管彼此視同冰炭水火，但無論立場如何，革命和不革命還能進行正面討論，實際上也還是同道。梁啟超和一部分同門，不僅在論述古今中外的革命方面頗多貢獻，而且一度在革命、撲滿與否的選擇問題上掙扎。如果不是康有為的堅決阻撓，情勢的發展很可能大不相同。

隨着革命日益被更多的人視為徹底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不二法寶，其後的情況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尤其是「反革命」概念的出現，令革命的進程增添了不少變數。一方面，爭鬥的各方都以革命的正統自居，表明革命已經成為政治正確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則互指對方為反革命，視為與正面之敵同樣的革命對象。如此一來，不革命順理成章地和反革命畫上等號。革命與否，再也不是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的論題，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你死我活的較量。其中潛在的邏輯危險，在開始時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隨着革命成功地進行和不斷擴大，逐漸釋放暴露出來。當反革命從政治概念上升到法律層面，事情便開始向着難以掌控的方向變化。畢竟以國家權力強制所有的國民進行革命，法理上不能成立，實際上也難以執行。在冠冕堂皇之下發生種種匪夷所思的事，也就不足為怪。

凡事物極必反，以「革命」的名義走向荒誕之際，撥亂反正就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結束了20世紀最後一次以「革命」標名的歷史時期，「反革命」自然依次從法律層面正式退出，在政治層面也逐漸隱身淡化，革命與否的問題不再是全體國民社會生活的頭等大事。借用周予同關於經學退出歷史舞台而經學史興的意思，當革命從社會政治生活中退隱之時，對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研究，恰好提上日程。所謂「告別革命」，如果指20世紀末的實事，一般而言，應該異議不大（當然不是沒有），但是用這樣的觀念看待整個20世紀革命的歷史進程，則並非史家應有的平心之論。至於用主觀預設的陰謀論倒述歷史，更加不在話下。

轉換角度，20世紀中國歷史的起點和終點，還可以從兩次改革的成敗加以考察。世紀初清政府的新政和預備立憲，最終徹底葬送了中國的皇權帝制。就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這一初衷而論，可謂敗得一塌糊塗。而世紀末進行的改革開放，保守的估計，也應該說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可是，清末新政的失敗，究竟敗於何處，還有討論的餘地。如果任達的看法大體可以成立（具體可議之處甚多），慘敗的清末新政實際上留下了重要的歷史遺產，甚至可以說訂定了此後中國的觀念和制度變化發展的基本方向，使得歷史至今仍然沿着既定的軌道運行。就此而論，影響可謂深遠，而決策亦可謂正確。儘管清王朝的本意並沒有那麼高瞻遠矚，大公無私。

既然改革的大方向沒有錯，何以導致失敗結局？深入一層看，清王朝慘敗的同時，全體國民也沒有受益，所不同的是，國民的失敗體現於過程，清廷的失敗體現於結果。出於維護和鞏固其統治的需要，清王朝改革的動機並非一概虛偽。但是改革必然涉及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如何才能兼顧各方，惠及多數，必須通盤協調，循序漸進。如果一味維護一己之私，甚至將改革作為集權和剝奪的手段，則改革的舉措勢必在時間與方向的拿捏上，變得躁進或遲緩。不僅國民，連統治者內部的不同集團也不免成為犧牲者。多數人未得其利，先受其害，那麼無論改革的動機多麼純正，方向多麼正確，都必然以失敗而告終。而確定失敗的形式，往往就是革命。當革命風暴驟起，天下大亂之際，鄭孝胥認為：「政府之失，在於紀綱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痛天下，暴虐苛政，則未之聞也。故今日猶是改革行政之時代，未遽為覆滅宗祀之時代。」<sup>[5]</sup>實則改革行政，處理不當，恰是覆滅宗祀的重要契機。

革命所收穫的成果不一定是勝利的喜悅，有時也會產生負面作用。如果將近代中日兩國的情形進行比較，反差明顯的一點是，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國民對國家和政府的認同度相當高，而中國進入共和時代以後，歷屆政府都沒有得到由臣民變成國民的社會成員的

---

5.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頁1352-1353。

普遍認同。從積極的方面看，國民認同度高使得日本發展順利，國力迅速強盛；反之，中國的國民則始終對政府進行強力批判，保持強大壓力。從消極方面看，獲得國民高度認同的日本政府逐漸失去必要的制衡，侵略擴張的野心加速膨脹，最終將國家和國民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而中國則內部紛爭不斷，政府更替頻繁，國家陷入分裂狀態，戰亂頻仍。如何擺脫分裂的局面？中國常見的手法有二：統一或分治。可是，二者均有其弊端。統一則專制集權，分治則割據分裂的惡性循環，中國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民初因為政局動盪，民眾生活相當窘迫，有人甚至質疑革命有無必要。當然，如果真的回到清末，這些懷疑論者恐怕還是一定要揭竿而起的。

革命與改革，旨在分別解決民族復興不同階段的問題，不可能相互取代。試圖用革命的方式來解決改革過程中的一般性問題，歷史證明並不可取，未來也絕不可行。如果說革命的收穫在於理想，改革的預期則比較實際，不能要求國民普遍繼續承受革命時期的巨大痛苦和犧牲。在此階段，相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人民解放和共同富裕更為突顯。在國權與人權的糾葛下，如何讓每個人的身心解放和富足與民族復興高度協調一致，成為21世紀中國任重而道遠的重大使命。失敗的改革尚且留下決定歷史進程不可逆轉的寶貴遺產，成功的改革至少應當確保歷史車輪，沿着正確的軌道長久運行。如果做到這一點，中國的21世紀將比20世紀來得更加精彩。

#### 四、內外的聯繫性

空間的整體性包括內外兩面。前者自1960年代美國修正學派興起，重審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區域研究逐漸推廣。開始主要是分省，其後逐漸下移，直到基層社會。其問題意識是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千差萬別，不可一概而論。加之在全國層面上研究問題，只能突出特定方面，而割裂史事的整體聯繫。所以其潛在取向為相反相成的兩面：既縮小範圍，又注重整體，或者說以縮小空間來換取整體觀照。不過，此類做法的生成，實由各國社會結構的差異（如民初社會的氏族部落各自分立，中世紀以來的城鄉分治以致彼此隔絕），未

能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忽略中國長期以來作為社會文化集合體以及政治大一統的整體性，一味強調區域差異，反而無由深究保持分久必合或合久必分的各項因素（如作為文化集合體的時間長，移民與土著的複雜關係，漢化與胡化等）。近代以來相當突顯的分省意識，雖然早有地緣歷史的淵源，其實主要生成於清代，晚清以後，受到外來的民族主義和地方自治思想的影響，才迅速被強化，成為社會成員交往行事的重要憑藉。

在了解和掌握全國歷史文化古往今來的基礎上，選擇某一區域做涵蓋各層面的整體性研究，可以避免陷入全面則失之寬泛表淺，具體則流於瑣碎局促的兩難，使得宏大關懷與深入實證能夠相輔相成。遺憾的是，實際操作起來，縮小範圍很大程度上成為訓練不足者刻意趨易避難的取巧捷徑，管中窺豹畸變為盲人摸象。基層社會的研究，又不免先入為主地假設特定區域即為同類，將其中形似而實不同的事物一概而論。結果，區域研究的所謂特色大都流於自說自話，最終難免千篇一律，不僅不見特色，反而導致片面和放大的偏蔽，甚至出現割裂集合體和各區域間基本聯繫的潛在危險。在整體之下研究具體，而不是簡單比較各地異同，才能消除看朱成碧的成見，避免故意誇大特點，導致突出特性否定共性的誤讀錯解，或是以一般為特性的偏見。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發現區域性特點，而不至於一味強求與眾不同，卻陷入大同小異的尷尬。

至於對外的一面，相互聯繫更顯重要。中國歷史上長期以天下中心自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佔據主導地位，即使吸收異教，創立新說，也要取珠還櫝，以免用夷變夏，數典忘祖，這使得中國文化數千年傳衍一脈相承。近代以來，公開標舉開眼看世界以及西化歐化之類的所謂國際視野，眼光向外、取法乎洋日漸成為時尚，一方面造成中西學乾坤顛倒，不僅全盤西化，而且挾洋自重，另一方面卻依然將中華置於世界之外，世界不過是洋的變形。辛亥時期的知識與制度全面轉型，形成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古今的分界，制約着今日中國人思維行為的基本樣式及取向。這一重大變化的源起，正是西學、東學和中學的交相作用。也就是說，中國在逐漸進入世界一體化的過程中，根本地改變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態勢，由吸收同化變成追模仿

效，其密集變化的集中階段，恰是辛亥時期。變化的條件就是：必須具有古今的縱貫和中外的橫通，方能清楚準確地認識知識與制度轉型的全過程和各方面。

中國進入世界，與近代東亞精神領域的共同性關係緊密。早在甲午戰前20年，西周等人以朱子學等中國典籍應對洋學，建構起東亞的新話語系統，已經決定了整個東亞近代以來的走向，促使近代中國人一方面在西學的衝擊下重估固有文化的價值，重建民族自信，一方面卻深陷日本式對應西學、解讀中學的纏繞和困擾。在提供新的思維及行為方式以便進入世界的同時，也造成不少的誤讀和錯解，使中國人對於中國的自我認識以及與世界進一步的溝通聯繫產生諸多障礙。辛亥時期，國人大規模逆輸入明治後的漢語新詞，又取法日本，實行包括政體、教育、外交、員警、地方自治等各種制度在內的全面改造。中國人無論其政治屬性如何，其思維方式和行為規範均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這些包含中西新舊複雜糾結的變化，未必全是進化，造成現在，卻不一定具有現代性。

因緣外力理解中國，如今已成中國人乃至學界普遍的觀念行為，由此造成認識上的許多似是而非，例證俯拾皆是。例如，關於近代中國城鄉關係的論述框架，儘管今人斷言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並且似乎理所當然地研究古代中國的城市與農村以及城鄉關係，實則清代以前，中國並無所謂後來清晰分界的城市與農村，更談不上明確的城鄉關係。觀念上，固然很少有城鄉之別；而事實上，也很難將城鄉截然分離。近代以來的架構，顯然既有歐洲中世紀城鄉截然分立的影子，也有明治日本城鄉自治的痕跡，還有近代列強入侵以來租界的效應。而在中國，有身份的士紳往往在城鎮有商號店鋪，在鄉下有土地田產，甚至一般流民也可以各種形式在所謂城鄉之間遊動。諸如所謂不在地主之類的概念，都應當檢討發源生成與移植適用的問題。儘管對於今人而言，遵循「回到無的境界，尋繹有的發生演化」這樣治史的基本途轍，幾乎是難能可貴之事。

清季受歐美日本的影響，城鄉分別的觀念日漸明晰，所謂城紳、鄉紳之說日益流行。即使如此，作為正式的行政層級和區劃，城鄉分別仍然令人相當困惑。預備立憲時期推行地方自治，制定頒行

《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第二節專門規定「城鎮鄉區域」，凡府廳州縣治城廂地方為城，其餘市鎮村莊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滿5萬以上者為鎮，不滿5萬者為鄉。人口若有增減，要經一定程序變更鄉鎮地位。<sup>161</sup>這樣的原則規定，不僅與後來的城鄉之分並不完全對應，具體操作起來也相當困難。例如，府州縣治的城牆之內為城，在城池完備之地似乎不成問題，否則就有些麻煩。至於城廂，究竟如何與鎮、鄉分界，大概多是因循舊慣。而人口變動頻繁，相關規劃很難做到隨時變更。直到清亡，並沒有正式的所謂城市建制。民初各地陸續開始行政設市。國民政府統一後，加強戶籍管理，居民的流動性逐漸受到控制。1950年代以後，城鄉居民身份的分別日趨嚴格，除了特殊時期和特殊情況外，要想改變身份，幾乎不可能。

科舉時代，作為四民之首的士子享有種種優待，可以利用所謂城鄉的一切有利條件，使得舉業成為能夠賺錢自活，甚至養家糊口的產業，與後來讀書便要花錢的狀況大不相同。在城鄉分界模糊的情形下，即便出現分別，所謂城裏人對於鄉下人的優越感並不太明顯。換言之，鄉下人也就不會以仰望的心態看待城裏人。後科舉時代，由於城市化加速進行以及社會新事業的層出不窮，加上新式學堂所教育的內容又不適合鄉土社會，以致士子很難繼續與故土結合，畢業不回鄉的問題日趨嚴重，城鄉差距不斷加大，以致一般人的意識裏，此前的城鄉也是涇渭分明，差若天淵。

或許這樣的情形令親歷者有切膚之痛，反過來制約其對於社會歷史的認識，很容易接受造成現狀或與之吻合的那一套觀念，或以為用後來觀念解釋前事，是不得不然，甚至勢所必然。此說固然有一定道理，或者說給今人提供了某種認識上的方便。問題在於，沒有後來觀念的古人，不易理解前人的行為及其言行的本意何在，但亦應該設法弄清楚，而不能因為難以弄清楚，便斷言沒有本意真相，並大膽用己意妄加揣度古人。一般而言，要麼認為古人無所謂本意，要麼不知如何解讀古人的本意，要麼覺得古人即使有其本意，

61. 〈憲政編查館奏核議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並另擬選舉章程折附清單〉，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728。

也不重要或是根本錯誤，因而無需追究。如此，則所謂史學，不是揭示歷史的本相，而是抒發各自的見解，即所謂一代人有一代人歷史，但凡歷史其實無不是今人的思想史。如果不能在重現古人本相本意的基礎上發揮見解，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沒有城鄉分別的時代，各色人等如何言說行事，至少是要首先解決的問題，然後才談得上如何認為。否則，認為完了，與史何干，就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竇。

由此而致的問題比比皆是。例如，受區域研究取向的影響，今人好將士紳視為地方的代表，姑不論直省是否地方，作為行政層級清季改制時，已經在朝野上下普遍造成很大的困擾，即使按照清季以來逐漸演化的觀念，將直省以下各級權力統統作為地方層級，士紳在不同層級活動時，其代表身份仍然並非固定不變。民初時，一些省份的原諮議局議員當選為國會議員，省議會的位置遂由另一批人接替。這樣的變化，很難用所謂國家與社會的架構加以解釋。在直省以下，他們的活動存在於各個層級，同樣很難認為固定屬於哪一層或哪一地的代表。

總之，治史必須貫通古今中外，整體之下研究具體，即使辛亥革命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波瀾，也要從江流曲似九回腸中察知淵源流變，才不至於隨波逐流，做了漫無目的的無根飄萍。